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西方经济的演变

郭 吴 新

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具有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中,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发展进程方面,可分为两大段。第一段(1914—1945年)除二十年代周期性高涨年份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在大多数年份都处于强烈震荡和破坏之中,这里既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化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破坏,也包括三十年代严重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它所受到的剧烈震撼和削弱。第二段(1946年迄今)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大体上从战后初期到七十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转入平时轨道和恢复的基础上,出现了约二十年左右的较快发展;后一个时期则自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过后至现在,是西方经济陷进滞胀和转入低速增长的年代,这一过程正在继续。在重大变化方面,总的说来,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西方经济中生产与资本的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得到了新的高度发展。确切一些说,这基本上是在二次大战后发生的;二是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实现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西方各大国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这两大变化又常常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由于上述重大变化,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是垄断资本主义,但已与战前特别是与本世纪初有明显差别,它已发展成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最主要特征的、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下面,我将按时间顺序,结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论述大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的演变。

二次大战结束前西方经济的剧烈震荡 和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

我们的分析从第一次大战时期开始。1914—1918年,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把本国的经济转上了战争经济的轨道,资本主义经济首次经历了全面的深刻的震荡。战争期间,各交战国经济的主要变化是:首先,服从战争的需要,各国政府空前地扩大财政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强制地用于巨额军费支出。按照加威·费斯克等的材料,参战国的直挥军费支出共达2,081亿美元,其中英国支出409亿美元,法国为336亿美元,美国为195亿美元,德国为470亿美元。^①据有的作者计算,这次大战期间各国军事支出每年约耗去国民收入的一半。^②其次,为及时供应和转运大批军需品,各交战国工交企业的国有化有了长足发展。如在德国,1913—1918年,国有军火企业规模急剧扩大,工人总数由4.3万人增加到20万人,即提高了3.6倍以上;国家同时拨出巨款,兴建了一批生产合成氮、精铝及电力的国有企业,扩大了原有电站的生产能力,并收购了部分私人电力公司的股票。在英国,战争伊始就把全国铁路暂时收归国营,其后又使一部分工业企业改为国营,政府在战时还出资兴建了389

家国营军工企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战争做了二十五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有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已经过渡到国家垄断。”^③再次，交战各国的政府建立一系列经济管制机构，按照军事化原则，对战时经济实行广泛的干预调节。德国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其中央经济管制机关开始是1914年8月起设在普鲁士陆军部下面的“战时原料处”，1916年冬它扩大改组成“战时管理局”，改隶于帝国国防部，进一步扩大了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权力。调节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的管制措施，即从扩大军需品生产到配售居民消费品，从工业原料、劳动力的分配到征购农产品，从扩大推行强制卡特尔——新迪加化到进出口贸易管制，从管制物价和工资到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④其它交战国的情况也相类似：英国政府依据1915年3月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案，成立军需部、军事局、农业局和商业局，分别管理军事工业、纺织工业、粮食及日用消费品等部门；1914年9月法国政府在陆军部下面专设兵器局，统制全国军事工业，同时将全国划为五个工业管理区，分设指导与监督机关；沙皇俄国在战时建立了国防、燃料、粮食和运输等几个“特别会议”，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军事统制；参战较迟的美国，1917年7月设立战时工业局，它作为中央管制工业机关，通过多种机构，掌握了调配原料、燃料和劳动力，分配国家订货，采购军需品，制定价格等各项事务。同德国相比，其它国家的战时经济调节起步较晚，多属匆促上阵，其措施和执行情况一般也不如德国严密。最后，除远离战场的美国外，欧洲主要交战国的经济，普遍地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国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在第一次大战的特殊条件下，交战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上述变化，究竟体现着什么新的特征？包含着什么历史经验？在这里，温习一下列宁的有关论述是很必要的。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⑤又指出，“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⑥当然，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是指战时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交战各国经济同战前不同的最重要特征。这一具有新特征意义的变化，至少包含着后述历史经验：（一）面临战争或严重经济破坏之类的紧迫形势，各国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被迫密切结合在一起，由国家政权采取强有力的对付措施。（二）这类措施的基本内容就是各国政府对战时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实行广泛的管制和调节。正如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还采取了普遍劳动义务制。”^⑦在分析德国情况时，列宁则说过：“在战争期间，为了集中人民的力量，曾经实行过一种由一个中央机关调节5000多万人的全部经济生活的办法。”^⑧（三）交战国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的实质，是在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基础上，力图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和高额利润。列宁鲜明地强调过，“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⑨只要出现相类似的历史条件（全面战争或大规模扩军备战），上述经验就会再次被运用，这在三十年代法西斯国家和二次大战期间一系列交战国的实践中，已一再得到证实。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特征的出现和战时各国国家经济调节活动的普遍经验，事实上表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首次运用。不过，这个新事物当时披上了军事化的外衣，人们对它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尚缺乏应有的认识。大战结束后，随着各国战时各种经济管制措施的相继撤销，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趋于消失，二十年

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大体上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可是，当资本主义各国人们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缺乏认识甚至淡忘的时候，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在论述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备、现代国家机构中执行登记、计算工作的机构等问题时，实际上对这方面职能及其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估计。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特大经济危机，它强烈地震撼和削弱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危机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普遍剧烈下降，其中美、德两国均缩减一半以上，即退回到二十世纪初甚至十九世纪末的水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高达3,000—4,500万人，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30—50%。农业危机异常尖锐，世界贸易额比工业生产减缩得更为猛烈。1931—1933年欧美国家又先后爆发了信贷货币危机，大批银行倒闭，整个信贷制度濒于崩溃，各国相继废止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摇摇欲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各国人民的生活空前恶化。

这次史无前例的深重危机及伴随它而来的各种异常尖锐的矛盾，使各国资产阶级陷入了极度混乱，宣告了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主张由国家在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潮在各国乘机兴起，其实际运用突出体现为三十年代美国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实验”和希特勒德国的军事统制经济两个典型，其理论表现则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

罗斯福新政以“反经济危机”为其政策主旨，罗斯福政府通过了大批法令，企图缓解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其干预调节扩展到财政信贷、货币流通、工农业生产和产品销售、劳资关系、城市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虽然未能摆脱经济萧条和防止1937—1938年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也收到了一定成效。^⑩希特勒德国的军事统制经济是另一种类型，即法西斯国家强力推行军事化经济的代表。同第一次大战时期德国的战争经济相比，法西斯德国的军事统制经济(包括扩军备战年代的军事化经济和二次大战期间的全面战争经济)，是在更高水平上和更大规模上的再现。在希特勒长达12年的反动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经济调节机构，推行了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几个“四年计划”，支出了庞大的军费(战前六年半支出400亿马克，战时五年多共支出6,22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92%，超过德国本土同期国民收入总额的15%)，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实行了全面的、严密的军事化干预和调节，对外则有组织地大肆掠夺各占领区，以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能源源获得高额战争利润。^⑪上述两个典型都标志着三十年代特大危机过后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又一次转变，但其特点和意义则显著不同。法西斯德国军事统制经济仍然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按其基本内容说来，不过是第一次大战年代战争经济的再版。而罗斯福的“新政实验”，则是和平条件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先例，即资本主义国家在平时经济基础上被迫对国民经济实行调节，发挥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首次重大实践，它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提供了新的经验，因而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的“新政实验”被打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再度转上战争经济的轨道，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对经济的全面军事化调节，在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了比第一次大战年代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各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战时经济调节机构，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分工之细，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大战时期。第二，通过增税、增发国债和通货膨胀等办法，急剧扩大军费支出，将战争负担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据不完全统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费共超过9,250亿美元，其中美

国为3,250亿美元,英国1,200亿美元,德国2,720亿美元,意大利940亿美元,日本560亿美元,法国150亿美元。各国国民收入的60%或更多均被军费开支所吞噬,^⑩如前所述,德国军费支出更远远超过本国的国民收入,而靠疯狂掠夺各占领区的财富来弥补。第三,全力发展军用品生产,相应缩减民用消费品生产。各国政府向垄断组织进行大量军事订货,并兴建大批国有军工企业,对原料的进口和分配实行严格管制,对军事工业优先保证原料、装备和劳动力,为此不惜关闭大批中小企业。第四,有些国家进一步推行强制卡特尔化,甚至淘汰小卡特尔,以加速生产与资本的集中。第五,在强制广大劳动人民勒紧裤带的同时,保证垄断资本大发战争横财。各国政府对居民消费品实行定额配售制度,配给额一再降低,工资常被冻结,人民生活被压到极低的水平。第六,除美国外,各国国民经济受到的损失和破坏极其严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由于战争的打击而被大大削弱了。

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向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大转变,同第一次大战时期的首次转变一样,是在战争的特定条件下特殊形态的(军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证明,一旦大战的特定条件消失,随着战时经济转入平时经济,战时的多种军事化调节措施就相继取消,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必然会再次隐退。这就是说,向战争经济和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虽然预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但仍属暂时性质,还不等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具有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至于罗斯福新政的实践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开展经济调节活动,分别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必要的理论依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过渡。

战后西方经济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 及其向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

二次大战后,西方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性的变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开始,经过整个五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新的小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经济实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干预调节,较充分地运用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促成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

整个说来,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的(美、法、英三国对外的局部侵略战争,只在一定时期对该国本身或关系密切的个别西方国家经济产生过局部影响)。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深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则是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前进的重要条件。^⑪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凯恩斯主义的传播,无疑也起过值得重视的作用。

战后西方各大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国家垄断经济的急剧扩大,国家垄断调节的普遍实行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国际协调和斗争的不断加强。

先谈战后西方国家垄断经济扩大问题。我所说的国家垄断经济,是指在垄断统治基础上,作为“总资本家”并与私人垄断资本日益密切溶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权,得以直接控制的一种经济。国家垄断经济包括:各国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所掌握的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并按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通过财政支出对这部分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国家垄断所有制的企

业以及其它资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29年均低于1/5,其中美、德两国仅占1/10;战后初期的1950年,都超过1/5,其中英国达到1/3;1968年大都进一步上升至3/10—2/5之间,仅日本仍停留在略高于1/5的水平;1975年西欧各大国的比重显著提高,法国为2/5,英、意和联邦德国均接近1/2,美国也超过1/3,日本则升至1/4。战后各国政府预算的急剧膨胀,当然同战后初期经济恢复任务及其后支持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分不开,同时它又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调节即行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基本物质前提和重要保证。以国家扩大投资为条件,通过新建企业或实行国有化的途径,各国国家垄断所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官私合营企业,战后都有程度不同的扩展。西欧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有企业投资分别占西欧四大国投资总额的22.7—33.5%;国家在物质财富再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分别为13.5%、20%和42%;国家在信贷——金融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在联邦德国和法、意两国分别高达54%、60%和75%。七十年代后期,在采煤、石油、钢铁、汽车、造船、电力、铁路、煤气、航空、邮政、电讯等11个重要经济部门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达到或超过一半的部门数,英国和奥地利均为10个,法、意两国分别为9个和8个,联邦德国及荷兰各为7个,比利时为5个,都大大超过日、美两国的水平;同时,国有企业劳动力在全国劳动力总数中新占的比重,奥地利为13.7%,英国8.1%,法国和爱尔兰均为7.3%,联邦德国7.2%,意大利6.6%。^④国家垄断所有制企业,既是国家经济调节的对象,又是国家行使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条件。

广泛深入进行国家垄断调节是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至为重要的中心内容。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持续地进行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程度深入的干预调节活动,其目的在于维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运行,缓和经济危机及其后果,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能够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国家垄断调节的内容和方式包括:(一)通过增加国家消费(七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约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1/5,日本占到近1/10)和国家投资,以及税收、补贴、货币、信用等财政金融政策措施,来促进国内市场和投资总额的扩大,推动经济恢复及其持续发展,并调整经济结构,扶助新兴产业部门和加速落后部门和地区的现代化。(二)适应新的科技革命深入开展的需要,国家大力支持科学研究活动。1955—1978年,美国科研及发展经费增长6.6倍,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相应地由1.55%上升到2.24%。同一时期,在美国全部科研经费中,联邦政府科研拨款超过一半,有些年份高达2/3。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国家支持下,联邦德国、英、法、日等国的科研实验费用也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三)为保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国家积极干预和发展公共教育、社会保险及保健事务,推行所谓“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并逐渐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各国社会保险与保健费用续有增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六十年代初期平均在1/7上下,到七十年代中期则接近1/5。(四)不少国家推行资产阶级“计划化”,制订并执行各种类型的经济计划(法国和日本在这方面较有成效),以促进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五)采取多种措施支持本国垄断资本的对外经济扩张活动,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由于战后国家垄断调节的空前加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政权,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调节者。

现在扼要地谈谈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国际协调与斗争加强的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联合的突出典型,它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在西

欧国家资本和生产国际化趋势加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组成并逐步扩大的。这个以西欧国家集团形式出现的共同体,为在本地区范围内实行超国家的经济调节和实现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它有力地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成员国经济的进一步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提高了成员国的对外竞争力量。近年来,美国也想与加拿大建立北美地区的经济联合体,但障碍甚多,尚无明显进展。当代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政府出面进行的国际协调和斗争,也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国际协调和斗争早已在一些重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等中进行。1975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其后的西方五国财长会议,作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协调和斗争的场所,充满了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和暂时妥协,它们正受到各国人士的瞩目。

上述三方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可以说,第二方面即国家垄断调节最为重要,国家垄断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这一调节活动创造必要物质基础的,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国际协调与斗争,主要又是国家调节在对外经济领域中的延伸。国家对经济的广泛干预和调节,现已成为西方发达各国国家的经常性职能,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已经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在成份。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弄明白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我们较深刻理解为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成为战后西方经济的最重要特征。

正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条件下,在国家对经济进行广泛干预调节的进程中,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而从五十年前半期到七十年代初,又进而获得了近二十年的较快增长,并发展成为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当代西方经济中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是人们所公认的现实,并有其一系列的重要表现。国家垄断是更高级的垄断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前所述,本身就是垄断资本社会化和国际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集中和垄断在西方发达国家又有长足进展,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随着跨行业、跨部门兼并活动的盛行和混合联合公司的大量涌现,形成了一批又一批跨行业 and 部门的垄断企业,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也随之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与此同时,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大发展及其成为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及发达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组成扩大,则是生产和资本日益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在上述各方面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财势也在日益增长,它们同国家政权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与渗透溶合日新月异,财团的组织形式也有不少变化,各国金融资本对国内外经济领域的控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都不断加强。

这一切表明,当代西方经济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但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它已远远超出了本世纪初尚处于开始发展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水平。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内容更为丰富、矛盾更加复杂深刻的垄断资本主义,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最主要特征的、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的转折与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

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运用,虽然对西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其后近二十年的较快增长,以及缓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和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

等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对经济的广泛干预调节,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不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仍周期性地发生,七十年代以来且有深化的趋势,战后在西方国家还发生过一些国别经济危机或中间性危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在继续起作用,西方各国长期存在数以千百万计的失业者和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仍在此伏彼起地进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掠夺的加强,激起了第三世界广大发展国家和人民的反抗,“南北矛盾”日益发展,廉价石油时代的终结只是这方面斗争的一个突出后果。西方世界的经济正在走向多极化的新时期,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之势已基本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协调虽在加强,但它们之间和各国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却越演越烈。

上述这些情况,加上战后前一段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积累起来的多种问题和矛盾,包括西方国家的长期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慢性开工不足与失业,等等,终于导致西方经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特点是:经过1973—1975年较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普遍陷入“停滞膨胀”的困境(美国经济早在七十年代初即已出现滞胀),即经济停滞、严重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状态。各国经济停停走走,回升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久又陷入一次新的危机即时间拖得更长的1979—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过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仍继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最近两年才逐渐脱出滞胀并存的局面,转入低速增长状态。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经济年增长率,1985年平均仅为3%,其中美国为2.7%,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平均为2.2%,只有日本为4.7%;1986年(预计数字)仍停留在低水平上,平均为2.8%,其中美国为2.5%,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平均为2.5%,日本降至2.7%。^⑮

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进入滞胀和低速增长状态,在西方国家政界、企业界和理论界造成了巨大震动和混乱,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陷入了危机。与此相应,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它们主要是:(一)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资产阶级理论应运而生,近些年来甚至成为英、美等国官方制订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二)针对国家垄断企业经营不善和财政预算负担问题,英、法、日等国近几年掀起一股重新私有化的热潮,相继公开出售一批国有工交企业或银行,或者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三)加强国际协调的同时,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明显激化,保护贸易一类措施有所加强。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新情况?它们是否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正在发生根本逆转?我认为,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七十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跳出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圈子,强调货币手段的作用,执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减税等政策,借以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回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事实。但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如赤字财政政策等,实际上远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摒弃,^⑯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仍在行使。因此,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心内容的国家垄断调节并未被否定掉,比较确切一些说,倒无宁是在调节的重点、手段和方法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当然,在此也不应忽视当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企图以修订过的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同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从而为当代西方经济寻求出路的行为。

关于国有企业重新私有化,也要从两方面加以观察: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重新私有化,的确减轻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财政负担,表明了国家垄断所有制的某种收缩,但另一方面,这

种收缩是有其限度的，国家能够出售的只是已在赢利或有赢利前景的企业，而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例如非由政府掌握不可，或者严重亏本而又缺乏改善前景等），是不会出售或者卖不掉的，它们仍继续是国家垄断所有制成份，此其一。国家所有制企业又只是国家垄断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某种收缩对国家垄断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因为各国国家垄断经济的更为重要的部分是迄今仍然处在高水平上的国家财政收支，此其二。另外，各国国家垄断所有制的变动常常受党派斗争形势的影响，新的政府上台，国家垄断所有制又有可能扩大，此其三。所以，国家垄断所有制的局部收缩，也不应看成是整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根本逆转。

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协调与斗争，时而此重彼轻，时而此伏彼起，更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向多极化发展的复杂经济环境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经济职能日益扩展的表征。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当代西方经济既已发展到了高度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水平，那么，任何使其倒退到过去那种单纯依靠市场自动调节的运行机制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日益激化，从整体上看，作为战后西方经济最重要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今后还将继续发展，西方经济的垄断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也将向更高的水平推进。

注释：

① 引自阿·米·阿列克谢夫：《资本主义国家战争财政》，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55年，第27、39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4卷第211页。

④ 详情可参阅拙文：《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军事社会主义”？》，载《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

⑤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6卷第365页。

⑦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4卷第277页。

⑧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23卷第276页。

⑨ 《列宁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140页。

⑩ 我对罗斯福新政曾作过专门论述，可参阅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章第二节。

⑪ 详情可参阅拙文：《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载《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⑫ 同注①，第40、26页。

⑬ 关于这方面的展开分析，可参阅：《世界经济》教材，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十六章第一节。

⑭ 关于战后西欧国家国有制等情况，可参阅拙文：《战后西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载《世界经济》1982年第2期。

⑮ 《1987年美国总统一经济报告》，第368页。

⑯ 参阅拙文：《战后美国国家经济调节和里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世界经济专号），1987年。